

中共“八七”會議報告全党黨員書

中國共產黨全体黨員鑒：

(一) 緒 言

同志們！

中央委 緊急會議現在致書於全体同志的時候，正是很困難危險的時期——偉大的中國革命遇到了極艱巨的磨折。今年4月間蔣介石在上海發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繼續發展而完成，三個月以前，武漢政府曾經宣布，蔣介石是革命叛徒，現在呢？他自己學了蔣介石的榜樣反革命，如今冒國民黨之名，甚至於冒“左派”國民黨之名，來摧殘工农運動，在武漢領域之內與蔣介石之治下是一樣的；他們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協會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運動的指導同志被武漢政府的將領所殘殺，农民運動所及的區域，無不受反革命的清鄉所蹂躪；工人亦是到處受摧殘，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他們的工會日益受着壓迫或占領，他們的指導者亦被殘殺，工會機關之中到處遇見軍閥豪紳指派來的走狗。壓迫得尤其嚴重的，便是我們的黨。一切反革命勢力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從反动軍閥一直到被革命所吓慌的小資產階級。然而現在他們不稱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蔣介石所領導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人民之公敵，却稱共產黨為人民之公敵。國民黨現在的領袖汪精衛等，卑劣無恥的叛背了國民黨的主義及傳統，接受軍閥的命令而與共產黨破裂。國民黨驅逐軍隊中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黨不得不秘密起來；因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滅我們。反革命暫時的得着了勝利，正拿着武裝來對付勞動階級。如果現在所有的工會還沒有搗毀淨盡，如果工农運動的指導者還沒有完全被殺，如果政府還在宣誓保全工农團體，那末，這不過是因為反革命的軍閥和國民黨的領袖還沒有完全集中團聚自己的力量。

我們要知道，如果群眾運動不能夠起來堅決的反抗，最近期間白色恐怖決不會減弱，只有越發厲害。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沒有絲毫的幻想！這所謂國民政府是什麼？他從革命的政權機關

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軍閥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衛之类，見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現時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鎮壓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着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經背叛了，出賣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衛孫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即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領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間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衛叛徒的旗帜之下能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厲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奪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捕灭反革命。

現在的形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农群众，壓迫群众运动，搗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阶级的先鋒。中國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党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产國際执行委员会对中國問題的历次決議，都說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國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勢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們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們党对于形勢变更之后的職務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國際执行委员会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党的指揮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錯誤，共产國際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評这些錯誤而糾正他們。这些錯誤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針，糾正过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确的規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艱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样錯誤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訓；我們党如果不糾正指导机关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开的批評这些錯誤。

王美玉打

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于怕波瀾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于披露之于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壞好了！這種攻訐，是吓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里學習出來，絕無畏懼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群眾的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群眾之奮鬥做保證——這些群眾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奮鬥，中國共產黨廣大的黨員群眾，艱苦犧牲的在社會下層工农城市貧民之中，實行真正革命的奮鬥。”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卻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的動搖和猶豫，在緊急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指導機關的非共產主義的不革命的理論，以及不革命的行為，不但絕對的與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們黨員群眾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廣東，湖南，本黨普通黨員群眾都有過偉大的奮鬥，屢次光榮的總同盟罷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動——最後今年3月的一次得着了勝利。這些都是光榮的歷史，不但在中國史上有無上的光榮，而且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也是如此。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是上海共產黨——無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堅決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國里的工人革命運動，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黨可以以上海的共產黨群眾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蔣介石屠殺之後，雖然受着聞所未聞的壓迫，許多最好的指導者（如陳延年，趙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殺，一切運動都壓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舊繼續着鬥爭，表現不可摧殘的偉大力量。廣東的共產黨員，領導

了鐵路工人的暴動以反抗李××，領導農民運動的武裝暴動能够在各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堅決犧牲的革命黨人，奮鬥到最后一滴一點的可能，這些共產黨員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勢中工人階級的先鋒的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運動的鬥爭，亦是這樣光榮的中國歷史里的一頁，農民協會的實際的政權，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群眾所創造的；自動沒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鄉村農民，解除豪紳團防的武裝，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嚴厲的鎮壓封建的反動分子，極偉大的農民運動的規模，而且會和國民黨下層群眾結合革命的聯盟——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聯盟——最後組織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關頭採取可恥的退社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努力的成績。這是解決土地問題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群眾，亦是如此。黨員群眾的行動真正是英勇徹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群眾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得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信用。黨的群眾是我們力量之源泉，有他們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沒有堅決實行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眾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會因指導機關之錯誤而陷于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后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指導。

（二）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于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里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正確些說：是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黨的指導每當解決這些革命之根本問題的時候，時常在理論上實踐上違背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及列寧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估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陷于最庸俗的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有生長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趨勢。中國革命尚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他反對帝國主義

壓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會經濟政治的遺毒。現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階級要求解除聞所未聞的壓迫制度，與奴隸制度之爭鬥；這種奴隸制度，正是帝國主義依據中國封建關係以建立其統治之基礎。

如果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那末，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簡直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共產國際向來反對這一般的觀點，認為是最壞的一種機會主義。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反對以國民革命的職任與階級鬥爭的職任相對立的觀點，這一類的觀點在西歐各國的極左派與社會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實這是拋棄中國民權革命中無產階級之領導權，拋棄領導權而爭所謂『勞工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之一種，實際上便使無產階級變成『民主管傘』的尾巴。”中國革命中各種社會階級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后，依據于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眾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制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破壞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羣衆加入鬥爭的愈多，歼滅地主豪紳的統治愈厲害——則國民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運動的勝利愈鞏固。

從另一方面觀察，外國資本在經濟上勾結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買辦），這一部分資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保存而擴大。

至於所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呢？那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的競爭而又受其排擠的一部分中國資本。因此，他們被逼而不得不对於帝國主義實行經濟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曾經參加中國的革命，甚至有一時期曾經做這一運動的領袖，然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及農民羣衆運動，提出革命的階級的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又大大的發展

• 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年4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决议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彷彿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

亦因自己客觀狀況的關係都利于革命的階級運動之勝利。然而小資產階級必然是動搖，猶豫徘徊于互相鬥爭的階級及革命反革命之間。這種猶豫與動搖，往往對於革命鬥爭的出路，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但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的態度，大部分由於革命階級運動的力量決定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鬥爭愈堅決愈劇烈，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愈深入，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向左傾，愈能站到革命的戰線上來；反之，如革命的階級及共產黨自己也表現動搖，不徹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加傾向資產階級的營壘，反革命的營壘。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除自己的堅定與果決外，沒有更真實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列寧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必先自己開始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我們是應當記着，社會主義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無產階級同道，無產階級應當明了小資產階級之搖動是不可避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自己應當有堅決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目前的問題。

凡此一切都是對於中國革命中各種力量的估計，足以決定共產黨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們黨的指導，在理論上，尤其是在實際上，剛剛對於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力量估計，有一個相反的观点。這就預定黨的指導之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維克派似的，將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彷彿認為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階級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中央在6月19日所發給上海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令說：“中國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國主義……現在幾乎忽略反帝工作”，彷彿專注意於進攻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結果。中央屬共產黨員走得太遠了，更叫本黨所領導的革命的農民往後退，這一指令里又說：“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去，別方面工农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农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共產黨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這樣中央那時認為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

是一事，這一信里又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為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顛倒工农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蔣介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能否便要沒收土地武裝工农呢？這個結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過渡這種難關，那就是資產階級勝利。我們應不應當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农的政策呢？這當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干起來，那末，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將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當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所遇的危機與困難，使革命深入廣出，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指令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國民革命運動是工人問題”，而要對各階級中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說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足見中央指導機關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質問題的見解都是錯誤的。

中央在這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整個兒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群眾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誰要替這個機會主義者辯論，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離別了。

(二) 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

級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同時，再要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時期中客觀上可以解決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群眾而指導他們的鬥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及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權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群眾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并激勵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領導工人每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要我們盡力量增進工人階級群眾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認識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同時共產國際指示必須迅速勇敢堅決的實行武裝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其中最覺悟最有組織的分子。這一政策國際是認為萬分必要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業區工人群眾自己鬥爭是相符的，和本黨黨員群眾的行動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黨指導機關却是走的別條路，他只在阻止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主權屬於政府。在各階級聯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時期，這一政府而且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這在客觀上是有種種的利益，實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實在大大的阻碍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業中之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為工人要求而鬥爭，須遵守勞動紀律的決議，我們中央並沒有反對。中央政府以為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有使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他們為自己階級直接的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說不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當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為對於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察是錯誤的。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觀念也是錯誤的。

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并且發生了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

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本家，而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機金融的紊亂。只要工會逮捕幾個廠主店東，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過火”。如是不僅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跟着亂叫，而且那時本黨中央也跟着這樣承認，中央有些文件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說不應占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閉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又說決不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黨，也是不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農民權獨裁進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反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不滿意，立刻便自動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為保存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起見，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勞動童子團。

國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嚴守革命紀律，還要工會去執行，違法者交政府管理，工會只准處罰工人。我們中央對於這個命令，一句話也沒有提出抗議，湖北省總工會接受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每次都說是“過火”或“幼稚”，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在是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經濟鬥爭上是如此，而且關於工人的政治行動，也是如此；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歷史意義的，但是這不但不是經過黨的指導機關而實行的，並且中央在事後還說這是不對的。最近中央曾傾向於自動取消上海的秘密工會，而使他們加入蔣介石的黃色工會，對於群眾的懼怕，不信任群眾的力量——在黨內問題里也是如此。黨的指導機關里占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要求之後，方少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許多工會之中指導者的黨員也不是工人，而是學生，知識分子。當要辦黨校的時候，中央非常堅決的要使工人分子減少些，說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識不發達，不覺悟；然而事實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識比黨的指導機關高的多，我們黨和這種非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透徹的機會主義，必須斷絕關係，永不沾染。

(四) 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不止一次了，這許多時候，共產國際曾經給我們中國黨明顯清楚的指示，指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亦就是繼續以前的指示。這一決議說：“要引群眾來鬥爭，只有在農村中依據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據工人階級需要之滿足及其政治權利的保障；堅決取消富農的田租，分配土地，沒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貧農所欠重利盤剝者的債務，禁止苛約，堅決的要求減稅，而使富人多負稅捐的責任，這些要求應當實行之于全國，首先是武漢政府領域之內。這些要求應當可以引起群眾反對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反抗北方軍閥。”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現時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幾千百萬農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而領導這一運動，並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中實行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己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時的政府，變成工农運動的組織上政治上的中心，變成工农獨裁的機關。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違背他的指示指令而做出來的，總之，只有自下而上的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及黨員群眾領導着，中央只是時時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于拉他向後轉。黨的指導機關，一直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農民土地問題的意义；第五次大會之前，黨的指導機關，對於土地問題，只有絕少的注意。1926年12月在漢口開的中央特別會議，提都沒有提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態度，雖然這一會議是北伐勝利後決定黨的任務的重要會議。各省历次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本黨亦沒有規定自己對於土地的政策（1926年12月湖南農民協會代

表大会及1927年1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8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陳獨秀譚××同志，却說現在只要擴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國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禮拜，以譚××为領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張，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擬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則上定出解决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國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議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議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擴大會議，甚至決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減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積極的斗争，甚至于已經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認某几种錯誤，然而始終繼續阻滯土地革命的方針到底。我們党實際上跟着國民党的small资产阶级領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針，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針，6月1日中央宣傳部通告說：“我們应当記着，我們党對於农民的政策是堅決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軍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6月14日的通告又說：“放任农民无組織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須糾正。”甚至于有一种論調，說武漢境內的过火行动是蔣介石奸細所做的——这簡直是跟着武漢將軍們說話，因為他們也說这些过火行动是蔣介石的奸細做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壓迫农民运动的人辯護。全國农民协会的訓令說：“蔣介石及土豪劣紳利用少数农民，侵犯軍人家屬的事，專門从事挑撥离間，他們为左傾之宣傳，然后再从而壓迫农民运动。”中國共产党負責指导者之一曾經說：“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發顫不安，他們覺得彷彿國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們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此說来，偉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驚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軍閥，甚至于驚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爭这

(四)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指導政策，亦是選了同樣的妥協主義，錯誤的鐵絲的束縛。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此問題的理論與實際，決不與共產國際之指示及黨下層機關之活動相似。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應持的態度，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上有特別詳細的規定，但在此決議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前給過中國共產黨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之觀點，曾經向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有過完善的通知，但我們中央在實際上的動作，恰與國際的方針相違背，這是證明黨的指導如何深遠的在那里執行自己的妥協路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有下面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的先鋒，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與最左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區別。

“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同，他應有獨立的力量；它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之下動員群眾的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它不應當放棄批評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之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只有這種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并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

“現在的局面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由勇敢的堅決的發展群眾運動的任務，中國共產黨應當勇敢的堅決的去變國民黨為真正包含城市與農村勞動民眾的群眾組織。

“共產國際指示中央對國民黨當前任務，須要有適合他們的組織形式；必須要向多與群眾接近的路線上去，尽可能的趕快改組，使廣大工农手工業者到國民黨的隊伍中來；工农兵士與手工業者的組織，實行團體的加入（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的儲蓄組織，兵士的組織，衣軍，紅槍會——除去反革命成分——

工人糾察隊等）。國民黨地方與中央機關應完全實行選舉制等等。

“只有此等堅決的去發展國民黨，使他們成為真正廣大的真正選舉的，真正群眾的，真正德謨克拉西的組織，才能創造發展中國民權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前途。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對抗國民黨右派一部分動搖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廣東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的反對那些背叛的軍官。共產黨應即時的暴露與蔣介石或帝國主義妥協的和種動搖政策，並且定出適當的宣傳煽動及組織的具体辦法。

“中國共產黨應保持與發展自己黨的組織，增加對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影響，他要担負起此等任務，則必須完全認識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組織之努力與鞏固，並吸收工人黨員參加黨的指導，提高黨在廣大工农群眾中的影響，並發展黨在群眾中的威權。”

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與國際決議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對於那些革命的主要問題，如工人問題，土地革命問題，對小資產階級關係問題，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等問題，所依據的立場，實際上既與國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一樣，則他當然不能保障共產黨自己獨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務。中國共產黨的中央亦與國民黨的指導犯了同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以致於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假使說共產黨還沒有完全失掉自己獨立的無產階級的面貌，則是因他的下層組織與黨的群眾的功勞。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與國民黨“右派”指導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數省分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國民黨中達到領導的影響，而中央却反對這些組織。在中央八月通過的關於國民黨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國民黨工作大綱）上說：“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應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体的建議，但是這些具体的建議不應根據我們黨的最大要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的左派”。從這個中央決議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一，“共產黨的最大要求”與民眾運動的利益是不一樣的，這是兩不相容，互相

沖突的兩方面；二，共產黨的“具體建議”不應該建築在黨的“最大要求”，就是說在現在革命的階級上不適用共產黨的政綱，策略與一般的政治路線；三，民族革命運動與國民黨“左派”只有在共產黨放棄自己“最大要求”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運動的正確策略之失散，恐莫此為甚吧！

再此決議上又說：“在國民黨報館服務的黨員，不當使此等報紙變為共產黨的報紙，而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這豈不是放棄共產黨獨立政策與政治路線之表示？！

共產黨的這種“服從作用”，他的領袖還正式承認，還以為這是很正確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嗎！國民黨內的共產黨黨團作用（如聯席會議之上）實際上已經被黨的指導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國共中聯席會議上，汪精衛說：只有國民黨中央有認可與公布通過的決議之權，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回答，竟同意于這種方法。共產黨領袖也有這樣說的：一方面自然共產黨員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別一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獨立，因為我們現在還須與國民黨聯合。有了這種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數主義策略基礎的妥協辦法，還要裝出莊嚴的樣子說，這是實際的“共產主義的策略”。共產黨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那末，對於國民黨的動搖，不徹底的騎牆政策，實際上當然不會有什麼批評，共產國際所要求的徹底激烈的公開的批評，當然更不用說了。關於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中央在黨整個公開的時期中，都沒有打算出版一分黨的日報（雖然國際之多次催促），中央关心的不是這些事，而是怎樣使共產黨員不在國民黨報上發表共產主義的文章！中國共產黨中央不看見國民黨群眾，永遠沒有打算過與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

對於領袖作用的估計過分，而估計群眾作用太低的流弊，可以從黨對於許多主要問題的估量看得出來。黨總是想着應當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應當使其中立；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群眾對此的態度如何。譬如為要使李××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省黨部的口號取消；為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1927年4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能出免他的職的口號；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由“左派”的領袖之

愿欲来确定，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閥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東聯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贊成北伐，但当左派決定東征，則中央也馬上通过那样的議決；虽然中央以前很堅決的反对蔣際代表不主張向北去的建議。在其他許多重要問題，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協的机会主义的路綫，是系于一个總的理論。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總出发点（特别是自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謂現時必須退让的理論。中國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我党所指导的群众确信下列的理論；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經走得“太遠”了。現在必須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聯合；当土地革命剛剛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剛剛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衛的組織正須要共产党的積極参加，使革命发展并鞏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聯合，筑下鞏固的革命基礎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者却說“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創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論。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論，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絕土地革命，为着所謂“过火”，贊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組織，以同样的口号去解散劳动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胆怯政策与最后所下的自动解除武装的糾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的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6月30号中央擴大會議所通过的十一条國共两党关系的議決案，現在指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國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聯盟的党，当然处于國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不是以共产党分子黨員資格參加；两党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义（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工农等民众團體均應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監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應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策公开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依据党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农群众

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國民黨主義，須武裝農民，但工农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只有避免政局之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九、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

這不僅是機會主義與妥協了，這簡直客觀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僅完全放棄共產黨的獨立，並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眾運動之存在！把所有的群眾運動完全交給國民黨資產階級的領袖去監督，並且是自動的交出來，還要說是“照例”。——這不是客觀上對於群眾運動出賣，對於革命變節是什麼呢？

共產黨領袖所認識的國民黨聯合方法是這樣的！這些認識是毫無半點共產主義政策的意味。列寧認為共產黨的黨員可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協商，但是在保持共產黨的宣傳，煽動，與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必要條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寧說，沒有這種條件，自然不能與之聯合，否則便是叛變。客觀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對共產主義的變節。列寧對於與小資產階級聯合時常說：“要注意『友軍』如同注意敵人一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則認為應當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分給工农運動很明顯的敵人。

黨應當在過去指導的錯誤中學習。黨應當明了他的力量，與他的將來，建築在工农群眾的身上，在他們的力量與他們的組織上面，黨應當要明白以後還是要與國民黨聯合，但是要与國民黨的左派聯合；與他們的下層群眾，與他們勞動群眾的黨員，與他們的下層的組織聯合。那種與武漢國民黨中央領袖聯合的路已經走不通了，誰能公開的反對國民黨中央是國民革命的叛徒，這些叛徒之中，誰配稱國民黨的左派！最後與我們聯盟的左派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執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們黨依據于武裝工农組織等的實現力量如何，並且要我